

1253
Z786

智慧香港

周振天 著



A0770932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香港/周振天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ISBN 7-5017-4288-6

I. 智… I. 周… III. 特写(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025 号

智 慧 香 港

周振天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1.75 插页:24 字数:23 万字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7-4228-6/F·3049

定价:45.00 元

作者前言

“智慧”一词源于佛教。

一个叫乔达摩悉达多的印度人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突然被生老病死所震撼,发生恐惧,于是躲进丛林,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若干年后,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一:佛教诞生了。小乘佛教教给人们断人欲,对浮华尘世无所留恋,这是小乘佛教教给人们对抗生死的智慧。而大乘佛教教给人们一切皆空。中国的道教与佛教同属东方宇宙循环论的文化体系,佛道与儒家相颉颃,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佛道教给人们更多的是如何面对生死,儒家则教给人们舍生取义,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更多的是英雄主义和超凡脱俗的智者哲学,我想,面对日益变革发展、平稳的社会如何作一个平凡的人,在大机器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作一颗真正意义上的螺丝钉,以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智慧奉献于社会人类,成为新世纪所需要的人才,使社会这个大机器平稳、正常、迅速地运行,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所提出的深刻命题。

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摒弃糟粕。

继承理想主义传统,剔除不实际的幻想和狂想。

继承出世哲学的精髓,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继承入世哲学传统,以凡人心态,谋社会进步,求个人生存发展。

继承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建设现代的、积极的、新的民族性格。

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说这些大的话题,与您即将翻开的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

为拍摄电视专题片《香港沧桑》,我和摄制组的同事们足迹遍布香港这个美丽的城市,我们的目光深入它的奇异历史,在我看来,香港不仅仅是一颗“东方之珠”,它更象一块璀灿的钻石,是一块玲珑剔透的多面体;我们深入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深入它的高度繁荣与蓬勃朝气。以一个“外来的故乡人”身份,我感受最深刻的还是一份深深的民族认同感和一份同样深深的惊奇,因此,在香港,在香港同胞身上,在香港的回归中,我发现了内地正在寻求的东西——现代人的生活智慧。

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在感受到中华民族高度的民族自信、自强,和曾被蹂躏、而今涅槃再生的民族尊严的同时,人们还会领悟到为了那涅槃再生中华民族所体现出的高度智慧。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and 典范,这不正是

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吗?!

香港的高度繁荣和经济奇迹,充分体现了同是华夏子孙的香港人所具有的经济智慧和现代意识。

香港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哲学,体现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中既有继承又有建设的生活智慧。

香港人的务实、勤劳、敬业、进取、合作精神,也正是我们建设新的民族性格所必须强调的一面。

在香港这个多面体中,无论是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哲学、生活,都无不折射出一种智慧之光,如果要我为这块香港多面体命名,我只能叫它作“智慧香港”。

在《香港沧桑》中,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淋漓尽致的展现,而我在拍摄《香港沧桑》近三年的采访笔记和有关思考的积累无不与这个命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让它们沉睡在抽屉里实在于心不忍。

请看看本书的目录:香港政界高层人士安子介、梁振英、范徐丽泰、钟士元,工商业巨子李嘉诚、曾宪梓、罗康瑞,著名学者胡鸿烈、刘兆佳,著名艺员沈殿霞,金融家郑海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希思,著名华裔人士陈香梅,中方官员钱其琛、周南、鲁平、黄华、李后、姜恩柱等等。

这些人和他们有关香港的一些思考、活动、无一不是一种智慧的象征,甚至是多种智慧的集合体,我相信,将这些集传统精华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人们介绍给读者,将对中国现代民族性格的和生活智慧的形成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用一些具体、感性而受人关注的人物和事件来为我所关注的中华民族智慧这一命题提供思路,是本书的目的。或许我的目标过于远大,而力量又十分渺小。尽力而为之,是我将这本书献给读者的自勉之辞。

第一部分

智慧的外交和外交家的智慧

——两位中国外交部长访问录

中国跟希腊一样是古老的文明大国，是东西方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两个国家还有一种惊人的相似处，即公元前3世纪前后，舌辩之术成为两国时尚。古希腊有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在广场上举行演讲比赛是当时盛事，获胜者可以戴上桂冠游行。有一位最伟大的演说家本是个结巴，但经过刻苦努力之后，一举成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游说”成为知识分子最热衷的职业，“范雎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庄辛说楚襄王”、“触轳说赵太后”等著名的游说故事举不胜举。苏秦年轻时被人瞧不起，于是头悬梁锥刺股，练就舌辩之术，以他超人的智慧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同时佩六国相印，传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线硕果累累，也传下不少趣闻轶事。据说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有某国官员不怀好意地问道：“中国建国这么久，国库当中有了多少钱。”周总理心平气和地答道：“哦，这我倒要认真地算一算。”略为思索后答道：“18块8角8分。”——这是当时中国发行的10元、5元、2元、1元等名类钞票面额的和。外国官员哑然。

不管这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大，新中国领导人确以他们的泱泱风度、智慧与学识给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创建了丰功伟绩。在香港问题上，新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们所展现出的卓越意识和超人智慧特别令人喝彩。本章所记录的，是前外交部长黄华和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

“至今为止，英国在香港行使的是典型的殖民地统治，但这不等于说，香港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

黄华如同往常一样对采访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但他说了几句，自己感觉不太满意，于是要求重来。这一丝不苟和细致也是黄华工作风格的一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随即派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工作。代表团到那儿不久，就发现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开列的殖民地名单中，也有我国的香港和澳门。根据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的精神，殖民地的前途通常是做总督的托管或公管，这显然不符合香港和澳门的历史情况和它的实际地位。代表团把这个情况及时地报告给中央，并很快得到答复。黄华作为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1972年3月8日，写了封信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萨里姆大使，阐明了我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在信中指出了

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更不应列入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在1972年6月15日,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和主张通过了决议,这一决议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从上述殖民地名单中删除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6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要求,这就排除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处理香港问题的可能性,大会表决的情况是99票赞成,5票反对。

当时,别的国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般都希望列入殖民地名单,以取得联合国的帮助,将来获得独立。而香港、澳门的情况很特殊,建国初期,中国政府表示到了适当的时机要收回香港,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充分利用香港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香港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下是一个通向外面的渠道,一个窗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就讲过,现在我们不谈香港的问题。当然,香港、澳门从联合国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也是和周总理对外交工作卓越的领导分不开的!

我问他:联合国大会表决时您在场吗?

黄华连连点头:当然。这是一件大事,在非殖民化委员会里面很多是我们的朋友,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向大会提出积极建议,认定香港和澳门不属于通常殖民地地区的范围,不属于联合国所要处理的范围。在国际上,中国的朋友确实很多。

我又问他:您记得周总理在处理香港事务上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黄华道:周总理和毛主席他们这一代领导确实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从全面和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当时美国共产党批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容忍有殖民地,我们国内一些人也有急躁情绪。当时,我们就发表了8个声明,说明中国不需要在香港问题上显示自己的勇敢和武力。我们回答美国方面的批评,难道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派一个师的兵去?离开这种办法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中央确实是有战略眼光,在适当的时机抓主要问题,不是盲目的一把抓,搞得自己很被动。正是这样的一代领导人开创了新中国的外交新天地,又为后来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了长远有利的铺垫。

一直等到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我任外长期间,时机成熟了,才跟英国展开了谈判。这个问题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实现了香港平稳有秩序的移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用任何威胁,真是象周总理生前安排的那样,稳住香港的秩序,保持香港的繁荣。

钱其琛外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是在钓鱼台外事会议的间隙,只有20分钟的时间。虽然繁忙,劳碌,钱其琛外长的面孔上却总是洋溢着勃勃生气和自信的微笑。他是我们的总顾问所以我先向他汇报了《香港沧桑》的拍摄情况,概述了在香港的感受,他很用心

地听着,颇感兴趣。

由于时间不多,我发问是开门见山的,希望一下子获得这位在中央政府中负责香港事务的副总理对于香港问题的最权威见解:请您谈一谈关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意义。

钱其琛: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进行的谈判持续了整整两年,从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谈判达成协议,1984年12月19日正式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我想解决香港问题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从历史上来讲,那是洗刷了我们民族150多年来的国耻;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它原有的功能不变,保持繁荣稳定,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从统一大业来讲,应该说是一个范例,一个榜样,对将来解决台湾问题有重要的影响;第四,从国际上来讲,是为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踏实下来,他讲的这四点正是我们片中所必需的,接下去我可以从容地问一些其它问题了:听外交部和港澳办介绍,谈判的前四轮很不顺当,中间还搁浅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请您介绍一下,我们是在什么问题上的绝不让步,在哪些问题上采取灵活的务实态度,才得以使双方谈判顺利进行。

钱其琛:因为香港问题谈判不是谈判主权是属于谁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香港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是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占领或租借的。所以要解决香港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中国必须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容谈判的。那么中英谈判主要有三个题目:第一是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要按时恢复对整个香港行使主权;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到底对香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第三是在达成协议以后,到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主权,在这个过渡时期,一些问题到底怎么安排?我们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当然,既然是谈判,总要达成协议,互相要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灵活务实的办法。举例来讲,英国一直坚持认为,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他们是根据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来争到香港的。我们认为主权是不能谈判的,那么这样就僵持了。中国政府的提法就是按时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英国人不能接受,那么最后经过灵活的处理,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采取分别阐述自己立场的办法。中方阐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措辞是,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措辞上看起来不一样,实质是一回事,这样就达成了协议,应该说是一种灵活处置的、务实的办法。

作者:我们在香港采访了好几个月,各个阶层的人都采访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1997年以后能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如果能,我们依据是什么?这是香港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钱其琛:1992年9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时候,就说过要保持香港的稳

定。但是并不是说香港的繁荣稳定只有在英国的管制之下才能实现,中国人管制就不行,不是这样。我们愿和英国合作,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能认为在中国管制之下,即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就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长期的稳定。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这一小块地方得以繁荣是由于我们祖国的强大、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繁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其次也是由于我们行使主权之后,对香港采取一种特殊的政策,就是“一国两制”,具体来说:一、根据宪法,香港要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二、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香港基本法,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三、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的基本内容不变,当然有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条款必须改变;四、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一个自由港,这个地位会继续保持。施行这样的政策,再加上有日趋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依靠,应该能使香港仍然能够保持它原有的功能,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并会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保证这个信心!

钱其琛外长谈兴正浓,自信、饱满生气的脸庞上又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情绪,似乎正在与香港一同遥想这颗东方之珠的未来。秘书不得不提醒他,马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等待他出席。

望着钱外长稳健的步履,我想对于这位外交部长,九七香港回归已是成竹在胸的事了,无疑 1997 年 7 月 1 日必将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当那一天到来之际,我们除了欢庆之外,还应当好好品味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中国人所奉献的力量和智慧。

“白发搔更短”

——鲁平访问录

“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的千古绝唱，活脱脱地刻划出一位忧国忧民，白发萧然的老知识分子形象。这个形象，与我心目中的鲁平颇为相似。

港人昵称鲁平为“白头鲁”，一头犹如银丝般整齐闪亮的白发是鲁平大儒风度的“招牌”。很可惜，鲁平刚刚做过大手术，病后初愈，人也消瘦了不少，白发也变得稀疏，当真有“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与我心目中呕心沥血的形象相符，但我还是耐住性子，等到鲁平的银发重又变得茂密抖擞，气色也日趋红润，才开始了对他的访问。

现在，鲁平又以他惯常的公众形象——白发大儒——坐在我们的摄像机前侃侃而谈。我们的心目中如同往常一样充满了敬意，我吩咐助理将鲁平头顶上的光打得多一点，这样，我们便可以一面注视着一头熠熠生光的银发，一面聆听一段熠熠生光的历史与现实——“一国两制”构想的成熟与香港的回归。

鲁平：“早在1979年，港督麦理浩来北京访问时，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当时邓小平同志就谈到解决香港问题可以采取一个特殊的方式，即现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这几句话虽然不多，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雏形。

“后来邓小平同志为了进一步探讨它的可行性，老人家又亲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了不少的重要指示，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对解决香港问题也同样可以适用。当时我们就根据他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我也是专门小组的成员之一。专门小组的任务就是对‘一国两制’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首先分析了香港经济成功的因素和形成这些因素的条件，然后分析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收回香港之后，这些因素和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是不是会继续存在？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和条件不但会继续存在，还会发展。”

说到对香港的调查研究，我在后期编辑查找资料时，看到许多鲁平率队在香港工作的镜头，有在机场回答蜂拥而上的记者，有与市民同乘电车聊天的情景，有与香港各界代表人物座谈的场面，可谓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正是在对香港历史、现状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鲁平对中国政府有关香港政策的实施才如此有信心。

鲁平接着说：“所以，如果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可以有保障

的。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香港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这十二条后来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

“我想说明一点，我们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一国两制’构想，不象有些人想象的是中英谈判的结果，而是在谈判之前就已形成了的，是经过小平同志和中央批准的。在中英谈判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十二条方针政策摆到桌子上了，这十二条并不是什么英国人替香港争取来的。

“后来这个基本方针政策又完整地体现在《香港基本法》和后来的《澳门基本法》中，这两个基本法实际上都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草拟的，实际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和具体化。‘一国两制’方针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小平同志亲自调查研究，经过周密慎重的考虑而决定的，所以它也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国家的长远国策。

“‘一国两制’，我的体会是，一方面它是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香港的现实，又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要使得香港在我们收回以后，能够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继续发挥它的桥梁作用，尽量减少一些波动，尽量做到平稳过渡。这个方针必须要既被香港人接受，我们也能接受，同时英方也能接受。对于香港，周总理生前就提出来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有它特殊的桥梁和窗口的作用。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是通过香港这个桥梁，来吸收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资金，同时也通过香港这个桥梁进入西方的一些市场里去；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也需要利用香港这个桥梁来进入我们这个庞大的市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一国两制’方针的原因，这是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第二，这也是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也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另外，从国际上说，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很多，有很多分歧，怎样解决这些纠纷，一般都是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一国两制’为解决国际纠纷树立了一个典范，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和平解决。”

坚持原则和灵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中国人的智慧中原本就不乏这种把水与火、得与失有机融为一体的办法，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这个智慧最生动的体现。鲁平也是深谙此道的好手。可以设想，在中国的官员中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些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又善于把握分寸的大师们，我们外交战线上还不知要生出多少硝烟，我们的边境线上还不知要响起多少枪声、炮声。

1990年香港机场谈判伊始，曾一度陷入僵局，在鲁平领导下的中方谈判组，即坚持了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终于在1991年6月30日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机场暨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鲁平在谈判中卓越的表现连英方的谈判对手、英国首相的外交私人顾问柯利达先生也不得不举起香槟酒夸赞道：“我非常钦佩你，你是一位杰

出的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从1978年就从事港澳事务的鲁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了如指掌。他一说到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自然又说到“一国两制”。

“我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它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在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才能谈到两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一直是很坚定的。我记得在中英谈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僵局。因为英方当时坚持要‘把主权换治权’，就是香港的主权可以交还给你，但香港还让我管理下去，对这一点我们坚决反对。后来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见了小平，她还是提她的设想，甚至说，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办法收回香港的话，一定会在国际上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当时小平同志就回答得很干脆，他说，如果会产生什么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这句话彻底粉碎了英方主权换治权的设想。自此，中英谈判才真正开始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主权是不存在问题的，我们对三个不平等条约始终没有承认过。在我们来说，香港的主权一直是属于中国的，只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霸占了，霸占后我们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所以我们现在说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不是说收回主权。这个问题我们的立场一直是很明确的。”

“更早一些时候，麦理浩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试探呢？因为离1997年近了，虽然1979年离1997年还有一段时间，但有一个《新界租约》，到1997年6月30日满期。新界土地要卖出去，一般地契年限要几十年，年限短了没有人买，没办法进行土地交易。他到北京来是试探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并提出一个设想，要求我们同意他把‘新界’‘地契’的期限延长几十年。这个问题我们也坚决把他顶回去了，我们说，我们决不能做第二个李鸿章。因为这等于我们承认‘新界’租约，那英国就能继续统治下去了，‘新界’一定要回归祖国。但解决‘新界’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如果香港离开‘新界’就无法生存下去，水、电、飞机场都在‘新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同意来跟我们进行谈判。”

“我要再一次强调，要先以‘一国’为前提，然后才能谈到‘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是这样，解决澳门问题也是这样。“我的第二个体会是这个‘一国两制’中的‘两制’要两方面理解，两方面都不变。现在往往有人就强调香港将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五十年不变，甚至更长时间不变，这是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是同意的，这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也有明确规定。但是往往忽略了另外一面，就是‘一国两制’的‘两制’必须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能变，变了以后就不成为‘一国两制’了。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就完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必须建筑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之上。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反复谈过，要两个不变，不是单单一个不变。”

“我的第三个体会，要实行‘一国两制’，根据小平同志的设想，就是要采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香港在1997年7月1日以后，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但自己又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权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由香港人自

己来管理。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各个省市都不能干预它自治范围内的日常事务。中央就负责管理国防、外交和其他一些属于中央管辖的事务,这主要是为了使‘一国两制’能够真正在香港贯彻实施。小平同志提出过,我们决不能够用解决上海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要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小平同志提出在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后过渡期的后半段,要让港人来参与。他当时指出:不参与不行,不参与就不熟悉情况,在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人才,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1997年以后的香港。我们也是一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整个过渡时期里尽量吸收香港人来参与。我们成立了预委会,吸收香港人参与,现在我们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百分之六十的委员都是香港人,我们还聘请了四批港事顾问和两批区事顾问,今后我们还要成立一个由400位香港人参加的推选委员会,这都是港人参与的具体例子。我们准备再进一步广泛地听取港人的意见,能够尽量发挥香港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1997年7月1日以后,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各方面都实力雄厚的香港,做到真正平稳过渡,对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对香港的回归,鲁平不仅仅是因为身任其职才尽力工作。他之所以为之呕心沥血,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情感背景的,正如他讲过的,他是生在上海外国租界环境下的,对国家的耻辱,对民族的尊严,他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鲁平少年在上海租界长大,并在洋学校就读,虽然接受洋教育,但由于亲眼见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饱受屈辱,深知国家的强大才是人民扬眉吐气的保证。从儿时开始鲁平就是一个决不奴颜卑膝的孩子,与洋孩子打群架他常常充当“急先锋”的角色。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进入了上海租界,鲁平念的英国学校被日本人接管。有一次,日本教师带领同学喊“大日本万岁”,鲁平却高呼“大中国万岁!”。为了惩罚那个蛮横无理的日本教师,他故意把讲课桌放在讲台的边缘上,教师轻轻一碰,讲台突然倒地,令日本教师在全班学生的哄堂大笑中尴尬倍加。

当然,今天的鲁平早已没有了孩童时代的那种稚嫩的斗争方式,但是爱国精神已凝结在他的血肉之中,融会在 he 从事的港澳工作之中。他爱祖国,所以爱祖国的领土香港,说起香港的繁荣,他喜形于色,说起香港与内地的血肉联系他更是滔滔不绝。

“香港的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是由于它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背靠大陆,面对东南亚,祖国有广阔的土地,庞大的市场,祖国的经济发展对香港地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我们通过香港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百分之六十多的外资是通过香港引进的,我们还通过香港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同时我们也通过香港进行对外贸易,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需要利用香港来进入中国市场。香港不仅有地利,还有人和,这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条件。这几年香港的经济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跟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很多香港人都有这个体会。只要祖国能够继续保持社会稳定,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香港的稳定繁荣就有保障,反过来,香港的稳定繁荣就很难有保障,这是香港

各界人士一个普遍的共识。”

作者：“您长期做港澳工作，经常接触香港各界人物，您能不能谈一谈香港同胞对国家的情感和他们对 97 回归的认识？”

鲁平：“香港人对祖国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因为香港的确受了一个半世纪英国的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国家意识的确是比较淡薄的，这也是个事实。它的教科书里面，从来不谈近代史，也没有什么鸦片战争。《林则徐》这部电影在香港就不准放映。它的历史教科书说，英国之所以要占领香港，就是因为采取了一个闭关自守的政策，它要进行自由贸易，所以爆发了这场鸦片战争，这个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歪曲历史的。在这种影响下，香港人对祖国比较淡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中英谈判，我们决定要收回香港之后，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在逐步加深。他们逐步认识到香港的存在，必须依靠强大的祖国，而且随着我们国家的逐渐强大、昌盛，他们也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他们可能在香港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过去英国人采取一种怀柔政策。本来 60 年代时，英国政府对香港采取过高压政策，后来逐步转变，所以 60 年代以来成长的一些人对英国的统治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但他们一到了外国，就感觉到不一样，过去在外国的一些地方，中国人不单单是三等公民，到处被人瞧不起，到处被人歧视。但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他们一到外国去，就感觉到作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中国人是站起来了，过去我们是低着头过日子，现在我们是真正站起来了。特别是我们卫星上了天以后，我们到香港办了一个展览，观众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非常踊跃，过去香港人不知道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有这么大的成就，现在看到了感觉到作一个中国人很值得自豪。当然国家观念的逐步加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还应当对香港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港人称鲁平为“白头鲁”，我觉得这个绰号没有贬义，可以看作是港人对他的昵称。但是港人对这位中国官员的过去是不是很了解呢？为此，我有意将发问引向他个人的情感世界。

“当九七来临，百年国耻彻底被洗刷的那一天，您会有怎样的个人感受？”

鲁平：“港澳办创办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工作。那是 1978 年，由廖承志同志创办的，当时只有几个人，几位大姐加上我一个男的在华侨大厦租了几间房间。我参加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总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扬眉吐气。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受到外国的侵略和欺负。我是生在上海这个租界的环境下，当时中国人的确是抬不起头来，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趾高气扬，那时我的确是看不惯，这也是促使我参加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当时觉得非常兴奋，但是还有香港问题没有解决，澳门问题没有解决，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参加港澳办工作是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与完成收回香港和澳门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我虽然长期做行政工作，但我也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所以在参加香港这

个工作的过程中,我的确对香港也建立了感情。从心底里我希望,将来我们收回香港以后,‘一国两制’能够真正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我一直在跟我们办里的同事讲‘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所谓成功就是要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办里的年轻同志有很多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我们办里工作,说句老实话,在物质待遇方面比起其它机构来说要差得多。人家以为我们港澳办待遇很好,实际上我们是个清水衙门,什么其他的收入都没有,就凭工资来工作,但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投入,很少有不安心工作的人,这点也使我很受感动。我们大家是为一个共同的、神圣的使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我自己来说,我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一些贡献。我常常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要做一件对国家、对人类有益的事就足够了。从收回香港、收回澳门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国家和人类做出了贡献,我这一辈子也就没白活了。”

除了谈判桌上表现出坚毅不拔的性格外,鲁平还有情感丰富的一面。1990年2月,当基本法草案全部条款获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之时,鲁平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和全体起草委员们手拉手,高歌一曲《友谊地久天长》。事后鲁平仍难抚心潮地说:“总算为国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总算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出了一份力。”

对港澳工作,鲁平把他视作其工作历程的最后一站,“但我会鞠躬尽瘁”。1995年初,鲁平身体抱恙,大家都劝他抓紧治疗。但鲁平放不下已进入关键阶段的预委会工作,因为他肩负着预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的重任。也难怪医生惊讶地喊道:“你不要命了!”那年3月,鲁平率预委会各专题小组组长和部分委员赴美国,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西雅图、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主要城市,向美国不同阶层的团体和人士发表了近十场有关香港问题的演讲。刚回到北京,尘埃未拂,就又赴江苏省与部分香港事务顾问座谈,听取和咨询他们对香港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赴香港参加预委会政务、经济专题小组会议,并主持一系列调研咨询活动。香港活动的帷幕刚落下,鲁平又到澳门展开了一连串官式访问。在医院一再下达的“返京令”下,鲁平才拖着病体回到北京,躺在了洁白的手术台上。一些香港传媒,基于其固有的新闻观,对中方官员,特别是主管港澳事务的主要官员鲁平,往往是站在对立面来进行评论,经常存在着偏见。但是,当他们闻知鲁平因病住院后,一切攻击之词烟消云散,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联名送给鲁平一束鲜花和一张贺卡,衷心祝愿鲁平早日康复。在预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联欢会上,我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记者们一批又一批地拥到刚刚出院的鲁平面前问候的场面。那里面就有几位平日常对鲁平的观点进行非难和嘲讽的记者,但对鲁平的人格他们是敬重的。那一刻鲁平成了联欢会上最引人注目角色。

但在摄像机面前,鲁平却绝口不说自己的辛苦和劳累,他的话题还是集中在香港的后过渡期上:“从英国来说,当然它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它把香港看成是它王

冠上的一颗宝石，它叫香港是东方明珠。所以在中英谈判的时候，它一再坚持要以主权换治权，如果能继续统治下去当然是对英国有利的。英资大企业如汇丰、怡和，怡和在英国收购的企业都是亏大本的，真正赚钱的还是在香港。从本质上说它当然不愿意退出香港，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总是想在最大限度上保持在香港的利益，这是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前几天，梅杰在香港讲话，还用大量的篇幅谈这个问题，讲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英国还在道义上对香港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话很熟悉，150年前英国人就这么讲过，当时鸦片战争也是因为要保护英国利益打起来的。梅杰还号召国际上共同制裁我们，又有点象八国联军的味道。

“我举一例，关于新机场谈判这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好象我们和英国谈判是为了我们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会有新机场谈判，因为当时他提出来建新机场要花一千几百个亿，那么到了1997年，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呢？他们说只能留港币50亿，我们听了就觉得不是个味儿，50亿做什么事呢？我们就跟他们说，机场可以建，但你留给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必须要大大增加，就象一个老太太到菜场去买菜，讨价还价，一个钱一个钱地要他加、加、加，最后好不容易增加到250亿，一个钱也不能多了。我们还有一笔土地基金，到1997年也可以有700—800亿这个数，加上250亿，特区政府也可以过日子了。结果两国首脑就签了《关于香港新机场的谅解备忘录》。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分钱也不要的，将来香港财政独立，每一分钱都要交给香港特区政府，实际上我们是在替香港人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在机场问题是干预了香港自主权的范围，怎么叫干预了自主权范围呢？如果特区政府成立前这些问题我们一概不管，不去争，谁去争呢？就听任英国人这样做吗？到时候就留给香港50亿的财政储备吗？这样行吗？所以我们是真正在为香港人的利益考虑，反正英国人1997年就要走了，1997年以后怎么样，他根本不会管。我们是要看得远一点，我们要替香港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考虑，而不是只看到眼前，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祖国的昌盛共同贡献我们的力量。”

当特区首长人选已经产生，临时立法会成功组成之后，香港回归已是万事俱备，人们猜想鲁平终于可以歇息下来松口气了吧。但在从香港回京的飞机上，他在对港澳办的部属们感慨香港回归的历程之余又发出一道指令：大家都要想一想，“九七”之后，“港澳办”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应当为香港的繁荣和与内地的方方面面的沟通做些什么？

这就是鲁平。